

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施雪琴

近年来, 菲律宾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因数起涉及西方人士的绑架案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菲律宾独立后, 南部穆斯林分离武装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与政府军进行了至今长达三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虽然近年来菲律宾政府推行民族和解政策, 与南部最大的反政府武装“摩解”和“摩伊”签署了一揽子和平协议, 但事实证明单靠一纸协议很难彻底解决菲律宾的民族分离问题, 因为由于历史原因, 分离倾向在南部有十分深厚的土壤, 而且民族分离武装受当今国际上一些因素的影响, 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种势力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在冷战结束后, 世界范围的民族冲突剧增, 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现象, 民族问题正成为当前局部和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一些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借用现代国际政治所承认的民族自决原则, 追求民族独立和“跨界人民”的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①, 这已在一些地区成为事实, 如南联盟和苏联解体后多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探讨战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对多民族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宿怨

二战结束后, 在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里, 政治暴力和骚乱事件频频发生, 尤其是一些非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特别引人注目, 如相邻国之间或国内不同宗教、种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暴力斗争。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阐述了他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他把这种不同文明的邻国或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冲突称为断层线冲突^②。关于断层线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亨氏认为首先是历史上的冲突遗产, 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从菲律宾的历史来看,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冲突是今天菲律宾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的历史根源。

菲律宾穆斯林的历史悠久, 早在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期, 伊斯兰教就已经在菲律宾南部传播, 并且建立了两个伊斯兰苏丹王国, 即首都设在古达描的马京达瑙王国和首都设在和乐的苏禄王国。在 16 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到达吕宋岛时, 伊斯兰教已开始在岛上传播, 并建立了一些穆斯林小王国, 如马尼拉便是其中之一。但是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 大力在群岛

传播天主教，天主教在菲律宾北部岛屿的传播非常迅速，不过数十年，菲律宾北部的多数岛屿便迅速地“天主教化”。天主教的迅速扩张不仅遏制了伊斯兰教向北部的传播，而且它还极力向南部穆斯林地区扩张，企图把西班牙的统治和天主教文化扩展到菲律宾南部群岛，西班牙殖民者因此与穆斯林展开了长达 300 年的战争，史称“摩洛战争”。西班牙在菲律宾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菲律宾成为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如今，天主教徒占菲律宾总人口的 85% 以上，而自 13 世纪末便开始在菲律宾南部传播的伊斯兰教则成为菲律宾第二大宗教。据 1975 年的调查，菲律宾的穆斯林不少于 300 万，约占国内总人口的 7%^③。菲律宾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棉兰老岛（Mindanao），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以及巴拉望岛（Palawan），共有 12 个讲不同语言的部族。

在西班牙统治菲岛时期，西班牙当局竭力宣扬天主教文化，贬低伊斯兰文化，最终目的是要把菲律宾穆斯林西班牙化和天主教化。西班牙人对穆斯林的这种文化歧视反映出世界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二者之间长期的竞争与斗争。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极具扩张性的宗教，历史上二者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伊斯兰教在其诞生后迅速扩张，在北非、伊比利亚、中东、中亚、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地区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看来，穆斯林是其最古老的对手，伊斯兰诞生不久，便对欧洲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抗击穆斯林的攻击，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曾多次东征，企图夺回圣地。但基督教世界的反抗直至 15 世纪才取得胜利，1492 年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标志着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随后伊比利亚人首先进行的海外发现也把消灭穆斯林作为其目标之一^④。于是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战争便扩展到其所到之处。

在欧洲国家中对穆斯林最深怀恐惧和仇恨的应是西班牙。历史上，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曾长期处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的统治之下，后来经过长达 8 个世纪的斗争才将摩尔人赶出西班牙国土，并在斗争中实现了西班牙国家的统一。对天主教的狂热信仰和对穆斯林的极端恐惧与仇恨可以说是西班牙人的传统，并且这种传统随着其后来的海外扩张而被带到新占领的殖民地。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北部后，南部的穆斯林成为他们的传统和现实中的敌人。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对南部穆斯林长达三个世纪的战争除了加深双方的仇恨和冲突外并没有在南部取得任何有效的统治。

从菲律宾的历史来看，西班牙殖民统治对天主教文化的褒颂和对伊斯兰文化的贬斥造成了两种文化的深刻对立。西班牙殖民者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化身，而穆斯林则被贴上“另类”的标签：丑陋、懒惰、叛逆、欺诈、极端的宗教狂热^⑤。殖民时代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戏剧“摩洛—摩洛”便充分反映出天主教徒所怀有的那种文化优越感。此类戏剧大都讲述穆斯林如何被天主教徒打败，穆斯林首领皈依了天主教，大督的女儿爱上了西班牙军官，如今这类戏剧仍然在天主教的节日里上演。在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美国人对穆斯林的看法同西班牙人如出一辙，他们对菲律宾穆斯林的政策与西班牙殖民政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⑥。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初期，它对南部穆斯林的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怀柔和绥靖，一方面又用高压政策来镇压穆斯林的反抗。在军事统治确立后，紧接着实行同化政策，开办公共学校，用英语授课，派遣传教士宣扬新教。美国和西班牙“摩洛政策”的目标和本质都是一致的，其目的是要把穆斯林纳入菲律宾统一的殖民政治体制之中，其本质上都是宣扬两种文明的差别与优劣，用基督教文化来同化穆斯林。殖民统治特别是长达 300 年的“摩洛战争”对菲律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两种文明的优劣和对立使两个信仰不同的民族很难形成的统

一的国家认同，而南部穆斯林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反而更加团结，加强了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不同区域的穆斯林纷纷打破语言和区域的藩篱，促使“大摩洛”在观念与地域上的形成。而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基督教文明的灌输使菲律宾北部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完全西化，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人认为自己代表先进、现代化与进步，而穆斯林代表的则是落后、愚昧与野蛮，并且这种思想到菲律宾独立以后还存在。1972年，反穆斯林恐怖主义组织的基督教民兵组织“伊拉加”的一名成员致信给一位著名的穆斯林领袖，参议员多墨高阿龙托，他在信中写到“菲律宾穆斯林的贫穷和落后是因为他们坚持伊斯兰教这种错误的宗教信仰，……如果穆斯林在西班牙人到来时接受天主教，整个国家早已经完成了统一。你和你的民族不能再坚持这种错误的宗教，它只能带来贫穷、愚昧和黑暗。”殖民统治的遗产成为影响今天菲律宾民族融合的障碍^⑧，可以说它是当代菲律宾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兴起的历史根源。

二、菲律宾政府的同化政策

当代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兴起，除了根深蒂固的历史宿怨外，菲律宾政府对穆斯林民族的同化政策可以说是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的主要原因。一些学者在分析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认为，由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且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形成一种“内部的殖民关系”，使边缘地区的民族产生“受压迫、受剥削”感，从而产生了分离意识^⑨。在菲律宾，为缓解北部吕宋岛与比萨扬群岛的人口压力，从自治政府开始，就大量地向南部穆斯林地区移民，结果移民对穆斯林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从而遭到穆斯林的强烈抵制，最终引发了分离运动的产生。

（一）移民问题

土地问题一直是菲律宾农村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菲律宾许多农村骚乱和政治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和比萨扬群岛，地少人多，从美国统治时期就开始向南部岛屿移民，特别是棉兰老岛成为大量天主教徒移民的地区。从1903—1939年，从北部移入棉兰老岛的移民有近70万，而从1948—1960年，迁移到棉兰老岛的移民人数达到125万。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棉兰老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1948—1960年，棉兰老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达到87%，是全国人口增长率41%的两倍多，同一时期，全国人口增加2倍的省份共有7个，而6个是在棉兰老。在棉兰老196个城镇中，近一半城镇的人口增加了1倍。移入棉兰老的移民50%以上的集中在哥打巴托和达沃，1948—1960年，这两个省的移民数达到79万，而在布基农省，人口数量是以前的2.25倍，其中80%是来自北部的移民。这时期，棉兰老岛不仅移民数量激增，而且移民的定居地从以前传统的定居地扩展到周边地区^⑩。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天主教徒的大量移民使穆斯林的传统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移民增加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土地纠纷。在穆斯林社会的传统观念里，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归大督所有，并且土地还是财富和权力地位的象征。但是移民的增加使穆斯林传统的土地制度瓦解。政府为了让移民获得土地，实行了土地登记制度。天主教移民一般都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实力，很快地就遵照土地登记程序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多数穆斯林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对政府的政策法规产生了误解，许多人认为是政府要依据土地

对他们进行收税，于是弃之而逃或者是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卖给了天主教移民。当他们明白以后，已经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而一些天主教移民更是利用官员的腐败，用金钱贿赂他们，对穆斯林的土地区巧取豪夺，使大量贫穷的穆斯林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土地。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并且逐渐升级。

其次是移民增多引起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人数比例严重失调，在南部棉兰老省的一些地区穆斯林反倒成为少数民族。如在哥特巴托省，1935年穆斯林占总人口的55%。天主教徒占45%。而到1948年，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天主教徒的数量急剧增加，占总人口的65%，而相比之下，穆斯林的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许多，只占人口数量的35%。在拉瑙省的北部，战后由于大量移民从比萨扬群岛移入，1959年，拉瑙省一分为二，北拉瑙成为以天主教移民为主的地区，穆斯林人口只占26%；而南拉瑙还是以穆斯林为主，天主教移民只占6%^⑩。在有的地区，天主教移民人口的绝对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穆斯林的人数。如北拉瑙的卡帕塔甘盆地（Kapatagan），1918年天主教徒的数量只有24人，到1941年时，猛增到8000人，到1960年，竟增加到93000人，而马拉瑙族的穆斯林人口仅有7000名左右^⑪。天主教徒与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巨大悬殊，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政治问题，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权力成为两个族群争夺的焦点，围绕1971年的选举所爆发的种种冲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0年，马科斯总统下令取缔由前哥达巴托省长尤德托戈·马坦组织的“棉兰老岛独立运动”，但是被取缔的该组织中的激进青年成员成立以建立“摩洛民族共和国”为目标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密苏阿里教授担任该阵线的主席。“摩解”的成立加剧了棉兰老地区的紧张局势。棉兰老岛到处谣传穆斯林要举行武装起义，许多天主教徒为此深感恐慌。在1971年的马尼利事件（Manili）、瓦奥事件（Wao）、塔古伯事件（Tacub）中，穆斯林群众遭到集体屠杀。政府军在处理双方的冲突事件时，明显站在天主教徒一方，而且还参与了天主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行动，于是，冲突演变成为穆斯林与政府军的武装对抗。1971年棉兰老地区地方行政首脑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气氛进行的。这次选举中，在一些穆斯林人口比例小的地区穆斯林候选人在选举中明显处于劣势。如在北哥达巴托，前菲律宾的警察总长，一个天主教徒与现任的穆斯林省长一起竞选，结果是天主教徒胜出，并且下面的大多数城镇的市长、镇长也由天主教徒担任。在北拉瑙省，穆斯林候选人在竞选中遭到全军覆没。1971年的选举意义重大，因为在一些穆斯林世代居住的地区，穆斯林长期拥有的政治领导权被剥夺了，特别是穆斯林上层精英的权利遭到损害，所以他们必然会充当民族分离运动的领袖，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⑫，达到其政治目的。

（二）民族同化政策

菲律宾独立后，在民族政策上还是沿袭了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者的殖民主义思想，其基本出发点是要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整合到菲律宾社会以天主教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当中。政府宣布他加禄语为官方语言，在南部穆斯林地区大量兴办公立学校，推行英语教学，宣扬天主教文化。但是这不仅没有赢得穆斯林的支持，反而遭到许多穆斯林的抵触，许多家长都禁止子女上学，担心他们因此丧失穆斯林传统的文化和信仰。政府在一些方面也考虑到穆斯林民族的利益，如一些穆斯林政治家被吸纳进国会，南部地区穆斯林居住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委任穆斯林担任，政府还成立了全国团结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tional Integration），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由穆斯林担任，在南部的经济开发和建设方面也

做了许多实事，但是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国家认同感仍然没有得到加强。菲律宾穆斯林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宗教文化和民族心理问题。因为穆斯林问题在菲律宾历史上的源起和长期存在，宗教文化的差异和对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异文化同化而丧失其文化特征，那么她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要素。在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在法律、文化教育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推行同化政策，引起穆斯林的强烈反抗和敌视，他们认为政府同化政策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消灭穆斯林民族。所以，菲律宾国家独立后，南部穆斯林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菲律宾民族整合政策的重大失误，“政府的整个统一计划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即认为如果能给穆斯林提供更多的道路、学校、医疗机构、公共设施、工厂、更先进的农耕技术、更高的教育、更多的就业机会，穆斯林就会被整合起来，就会同菲律宾天主教徒一样，……实际上，穆斯林对这种哲学深怀恐惧，因为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同化的哲学，反映出菲律宾主流文化对穆斯林宗教、文化及历史的轻视，而这正是穆斯林民族心理和社会认同的基石。”¹⁴

三、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民族意识的觉醒

战后菲律宾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的蓬勃发展，其动力还来自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地区的穆斯林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亚非地区先后出现了 35 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独立国家。伴随着伊斯兰国家的独立，新泛伊斯兰主义开始抬头。新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各个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倡导在当代情况下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致立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和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世界性泛伊斯兰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中最权威也最有影响的是 1970 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这三大泛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60 年代以后国际性伊斯兰活动日益增多，包括各种伊斯兰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以及在非伊斯兰地区的宣教活动。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伊斯兰国家间认同感的增强。

毋庸置疑，战后泛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菲律宾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加强。菲律宾南部各岛比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伊斯兰教盛行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和马来西亚的沙巴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双方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¹⁵。此外，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传教士也经常到菲律宾南部进行宣教活动，许多菲律宾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些知识分子到埃及、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学习，菲律宾穆斯林的领袖也常常参加伊斯兰组织召开的会议。

其次，伊斯兰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教育得到更广泛的开展。在二战前，菲律宾南部的清真寺仅有数十座，并且甚为简陋；而战后情况则大大改变。随着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宗教活动也逐渐增多，清真寺处处耸立，达数百座之多，并且建筑辉煌，与中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国

家的清真寺相比也毫不逊色。除此之外，在清真寺里也建立了伊斯兰宗教学校，穆斯林男女老幼争相报名学习，学校的教师都曾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深造过，课程主要包括学习先知撰写的阿拉伯语典籍、宗教礼仪、伊斯兰教的教义。一些地区的中小学也开设了阿拉伯语课程，讲授伊斯兰的神学、哲学和科学。马拉威、和乐地区还设立了伊斯兰的高等院校，一些大学里也专门设立了伊斯兰研究中心，对伊斯兰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宗教学校的建立和有关伊斯兰教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使菲律宾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更促进了穆斯林民族自我意识与宗教观念的回归。

第三，穆斯林政治组织的成立。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思潮对菲律宾穆斯林的政治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伊斯兰组织纷纷成立。如菲律宾穆斯林协会、穆斯林进步运动、伊斯兰宗教协会、苏禄伊斯兰会议、穆斯林青年民族协会、伊斯兰力量联盟、穆斯林律师协会、菲律宾最高伊斯兰议会以及伊斯兰援助等组织。这些新兴的政治实体大都有着明确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目标，对参政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而国家的政治权力却主要掌握在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入手中，这当然不能适应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成为引发骚乱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的建立有助于加强穆斯林的认同感和团结。

战后菲律宾穆斯林的觉醒和壮大还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1月日本占领菲律宾后，南部穆斯林也积极展开了对日军的游击战，游击队得到美国海军的大量武器援助，并且在战后这些武器也散落民间，无法收回。日本战败后，菲律宾得到大量战争赔款，其中穆斯林也分得相当一部分。巨额的金钱对穆斯林社会的觉醒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穆斯林的朝圣之旅得以实现，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纷纷建立，许多宗教活动也积极开展。更重要的是金钱改变了穆斯林的观念。传统的穆斯林社会没有货币的概念，他们日常的经济行为多是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完成的。战后的大量赔款和金钱的广泛使用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也开始追求有报酬的工作、开始向现金交易转变。而同时他们也发觉他自己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这反过来刺激了他们对富有的菲律宾天主教徒的不满和敌视^①，促进了分离主义倾向的孕育。

以上简要分析了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菲律宾政府要想彻底解决南部穆斯林问题，必须努力消除历史遗留的两个信仰不同的种族之间的隔阂，互相尊重双方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加强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积极发展南部的经济，尤为重要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在严厉打击民族分离势力的同时，扩大南部穆斯林地区的自治权力。只有从多方面在各民族中间构建对国家的认同感，才能根除民族分离主义。

注 释:

①在此用“跨界人民”概念而不用“跨界民族”概念，是因为有的学者对后者提出了置疑。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参见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1）。

②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文明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283页。

③Cesar Adib Majul, The Contemporary Muslim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5, P11.

④裴培、李在芹：《新大陆发现的宗教因素》，世界历史，1990（2）。

⑤Cesar Adib Majul, The Contemporary Muslim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5, P18.

⑥Peter G. Gowing, Muslim Filipinos: Heritage and Horizon,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1979, P38.。

（下转第45页）

科林·鲍威尔 7 月底访问越南，显示美国政府对发展与越南关系的重视。为表示越南政府改善越美关系的诚意，越南政府副总理阮晋勇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和商人代表团 12 月底对美国进行了巡回访问，开展政府外交和经济外交，进行招商引资活动。为了使访问取得更大的成功，越南国会在阮晋勇访美前两个星期批准了越美双边贸易协议，承诺越南政府将放宽贸易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允许美国全面参与从广告到电信部门的服务行业活动。

越南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在 2001 年发展得十分平衡。越南作为东盟组织的一个成员，正在谋求成为该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东盟组织中，越南利用与老挝、柬埔寨的特殊关系，结成一个令东盟其他国家不容忽视的小集体，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7 月底，越南政府成功地主办了第 34 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第 8 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东盟与对话国外长会议和第 4 届“东盟+3”会议，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作用。越南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1 月，国家主席陈德良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柬埔寨，显示出越南对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决心和信心。

注 释：

① “九大后越南的对外战略”载《东南亚纵横》，2001 年第 10 期。

② 《人民日报》，2001 年 11 月 1 日。

③ “Country Report, Vietnam”. July 2001, p7.

④ 新华社 2001 年 1 月 15 日讯。

⑤ “Country Report, Vietnam” July 2001, p7.

⑥ “Asian Survey” January February 2002 P87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振明〕

（上接第 40 页）

⑦ 同上，P42.

⑧ R. Joel de Santos, Jr., Reflections on the Moro Wars and the New Filipino. Peter Gowing Understanding Islam and Muslims in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1988 P99.

⑨ David Brown, 《From Peripheral Communities to Ethnic Nations: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88, vol. 61, no. 1.

⑩ Frederick L. Wemstet and Paul D. Simkins, Migrations and the Settlement of Mindan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xv, No. 1, 1965, pp91—97.

⑪ Peter G. Gowing, Muslim Filipinos: Heritage and Horizon [M],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1979, P192.

⑫ 同上，P189.

⑬ David Brown, 《From Peripheral Communities to Ethnic Nations: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 see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88, vol. 61, no. 1.

⑭ Peter G. Gowing, Muslim Filipinos: Heritage and Horizon,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1979, P210.

⑮ 金应熙《菲律宾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P732—733.

⑯ Peter G. Gowing, Muslim Filipinos: Heritage and Horizon,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 1979, P18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国平〕